

《蜀方言》

疏證補

紀國泰 著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蜀方言》疏證補

紀國泰 著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蜀方言》疏證補 / 紀國泰著. — 成都: 巴蜀書社,
2007. 5

ISBN 978—7—80659—987—7

I. 蜀... II. 紀... III. 西南官話—方言研究—四川省
IV. H172. 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7) 第 056663 號

《蜀方言》疏證補

紀國泰 著

-
- | | |
|------|---|
| 責任編輯 | 黃雲生 |
| 封面設計 | 藍 天 |
| 出 版 |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 (028) 86259397 |
| 網 址 | www.bsbook.com |
| 發 行 |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 (028) 86259422 86259423 |
| 經 銷 | 新華書店 |
| 印 刷 |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責任公司 |
| 版 次 |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 成品尺寸 | 203mm×140mm |
| 印 張 | 15.25 |
| 字 數 | 380 千字 |
| 書 號 | ISBN 978—7—80659—987—7 |
| 定 價 | 35.00 圓 |
-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工廠調換

序

在川師中文系 77 級的學生中，畢業後在大學中文系教古代漢語的不多，《〈蜀方言〉疏證補》一書的作者紀國泰同志算是一位。因此，他與我不唯有師生之誼，而且還有着名符其實的薪火緣份。

上個世紀 80 年代末，國泰同志曾來川師跟我探討《尚書·禹貢》注釋中的幾個疑難問題。作為師友，我便坦然相告：對經典古注的研究要十分審慎，因為這些古注歷經數代經師推敲和傳承，而這些經師無一不是學問淵博、治學嚴謹的訓詁大家；因此，要想在經典的古注中有所發現，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他後來發表的幾篇關於《禹貢》的訓詁文章，其見解之新穎、資料之翔實、論述之謹嚴，却能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被有關專家認為“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90 年代初，國泰同志又到川師來與我探討《史記·律書》中的“律數”和“生鐘分”的計算問題。原來他正在參加《史記全本導讀辭典》的撰寫，承擔《禮書》、《樂書》和《律書》的詮釋工作。讀過《史記》全書的人都知道，《禮書》、《樂書》、《律書》以及《曆書》，是《史記》

中學術性最強、語言最艱深的部分，因為它們不僅涉及多方面的古代思想文化知識，而且天文曆法和音律，屬於自然科學的範疇。讀懂原著已屬不易，要將這些艱深難懂的內容解釋清楚並且用現代白話將它們要言不煩地表達出來，沒有比較深厚的中國古代文化知識的積累和相當的語言功底，是很難勝任的。

就我所知，國泰同志的研究興趣是比較廣泛的。他立足於古代漢語這個大的領域，走的是古書訓詁的路子，旁及現代漢語和方言。其研究成果，涉及古漢語文字、詞彙、音韻和語法。他在90年代初發表的《鉅宋廣韻考正》一文，被浙江大學博導黃笑山教授列入《二十世紀唐代音韻研究綱要》，同羅常培、周祖謨、趙振鐸諸先生的論文一起被稱為“在這方面的重要研究”。《〈蜀方言〉疏證補》不同於其他任何一部方言著作的最大特點，就在於它是一部集文字、音韻、訓詁知識於一體的方言著作。它的作者告訴我，《〈蜀方言〉疏證補》耗去他十多年的時間，曾使他多次感到心力交瘁而又欲罷不能。

方言歷來是傳統語言學研究的對象。郭璞在解釋“訓詁”的定義時說：“此所以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爾雅·注》）所謂“方俗之殊語”即方言。中國地域遼闊、歷史悠久，故詞義有古今之異、語音有方俗之殊。因為方言的差異給人們的交際造成障礙或誤解的情況，早在先秦就已經普遍存在了，最典型的例子如《尹文子·大道下》所載的下面這個故事：

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臘者為“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

爲了消除方言對交際可能造成的干擾，古代的經傳、史籍、諸子

文章中就常常出現解釋“方俗殊語”的文字了。如《左傳·莊公三十年》載楚國以“鬥穀於菟爲令尹”，《左傳·宣公四年》解釋說：“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鬥穀於菟。”再如《史記·陳涉世家》“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索隱》引服虔注曰：“楚人謂多爲夥。又言頤者，助夥之辭也。”這種訓詁的內容和方式，其實就是解釋方言。黃季剛先生甚至把對方言的訓釋視爲訓詁的主要對象和任務，他說：“訓詁者，用語言解釋語言之謂。若此地之語釋彼地之語，或以此時之語釋昔時之語。”（見黃焯《文字聲韻訓詁筆記》）

揚子雲撰《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後世簡稱《揚子方言》或《方言》），開世界方言研究之先河。但是《揚子方言》無分地域，僅僅是針對當時全國主要地區的方言與官話（又稱“通語”）之間的差異來作訓釋。以中國某一地區的方言爲研究對象的著作究竟產生在哪個時代，現在還很難有定論。但是，以迄至目前所能見到的文獻記載看，最早對方言作“斷域研究”的著作，可能還是唐人李商隱的《蜀方言》（見周大璞《訓詁學要略》）。可惜李書已佚，無從得見。明季蜀人李實的《蜀語》便成爲唯一能够見到的最早研究地域方言的專書了。繼李實《蜀語》之後，清末成都人張慎儀撰《蜀方言》一書，將四川方言的研究工作引向深入。

由於張氏《蜀方言》以考證方言本字爲要務，而對方言語音多有忽略；加之張氏將不見於記載的俗語“概從屏棄”，這樣勢必影響到《蜀方言》在輯錄詞語上的標準；再加上受時代的局限，無從得見一些重要的科學資料，這也使他在對某些涉及現代科學分類知識的詞語的解說上難免產生疏漏或錯誤。

《〈蜀方言〉疏證補》在訓釋原著詞句的基礎上作了大量的考證工作，綜合運用文字、音韻、訓詁知識，不僅糾正了原著中的謬誤，而且多有發現、多所發明。全書要言不煩，深入淺出，所論必將大有益於讀者。這種“匡謬正俗”的工作是很有意義和價值的，但同時也是非常繁難和辛苦的，這就難怪它的作者說他“多次感到心力交瘁而又欲罷不能”了。

《〈蜀方言〉疏證補》付梓前夕，作者要我為這本書寫點什麼。由於我近來精力大不如前，視力衰減得尤其厲害，根本無法認真真地通讀全書，只能揀着感興趣的詞條瀏覽一通。因此我想，與其說些隔靴搔癢或者妄加褒貶的話，既不能令讀者滿意，還可能令作者失望，莫如將這評判的機會留給讀者吧。

道生與國泰同志相交近三十年，今以耄耋之壽有幸得見後學新撰，謹書短札以報。

是為序。

九五叟 樂山杜道生

丁亥仲春寫於成都獅子山

目 錄

序.....	(1)
緒言：關於“蜀方言”與《蜀方言》.....	(1)
編著說明.....	(45)
《蜀方言·凡例》疏	(47)
《蜀方言》卷上	(49)
《蜀方言》卷下	(252)
詞目索引.....	(467)
主要參考文獻.....	(477)
後記.....	(480)

緒言：關於“蜀方言”與《蜀方言》

《〈蜀方言〉疏證補》付梓前夕，我忽然想到了一個問題：由於本書對《蜀方言》多有批評，甚至持基本否定的態度，很可能有人會問：既然這是一部不被你賞識的著作，你為什麼還要花這麼大的力氣為它作“疏證補”呢？為了回答這個讓人費解的問題，我臨時決定寫一篇《關於〈蜀方言〉與〈蜀方言〉》的文章，並且將它置於卷首，權且作為本書的“緒言”。

一、試論“蜀方言”詞彙的來源及其特點

在北方話系統的各地方言中，像四川話（以下統稱“蜀方言”）這樣，很早就受到人們特別關注並且激起衆多研究者興趣的現象，是非常罕見的。中唐詩人李商隱並非蜀人，却是研究整理蜀方言、開創方言研究“斷域為書”體例的第一人^①。李商隱之後，研究整理蜀方言的多為蜀人。明代遂寧人李實著《蜀語》，清代成都人張慎儀著《蜀方言》，民國遂寧人唐樞著《蜀籟》。新

中國建立以來，對四川方言的研究整理工作更加全面深入，出現了一大批研究四川方言的學者，發表了很多關於四川方言的論文，出版了好幾部具有一定影響的專著和四川方言詞典。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世紀末，四川方言竟引起了西方人的興趣，並且有全面搜集整理四川方言詞彙的專著問世。在衆多關於四川方言的研究文章和著作中，大多是以四川方言詞彙爲對象進行的。這就不能不令人產生這樣的疑問和思考：四川方言的詞彙具有什麼樣的特點？古今中外的衆多研究者爲什麼會對它產生非常濃厚的興趣？這是本文試圖回答的第一個問題。

蜀方言詞彙的來源

蜀方言的形成，經歷了一個漫長而曲折的歷史演變過程。與蜀方言一樣同爲北方方言系統的東北方言、西北方言、華北方言，甚至與現代蜀方言有着密切淵源關係的武漢方言，如果將這些不同地區的方言跟普通話相比較的話，最具有個性特徵，也最能够被區別開來的，應當是蜀方言。蜀方言的“個性特徵”是怎樣形成的呢？這就不能不談到它的詞彙的來源問題。

（一）關於蜀方言的基本詞彙

蜀方言的基本詞彙來源於北方官話，這是現代蜀方言被歸入“官話方言”的主要依據。蜀本蠻夷，語言習俗大異於中原。爲什麼蜀方言竟然會是“官話方言”呢？史載，秦滅巴蜀，“移秦民萬家實之”^②，於是“蜀人始通中國，言語頗與華同”^③。漢初，蜀郡守文翁興學蜀中，以至“蜀學比於齊魯”，“漢徵八士，蜀有四焉”^④。迄西漢哀、平之世，蜀中已是人材輩出，其佼佼者便

有司馬相如、揚雄、嚴君平、王褒、何武、林公孺、李弘等人。應當說，秦漢兩代徹底改變了蜀地“夷”風，奠定了蜀文化與中原文化同源同流同步發展的基礎。“華語”也因此而成為蜀地官、民共用的通語。其後，儘管漢語語音經歷了中古、近古的兩次巨大變化，但是，由於中原地區與蜀地的交往日益頻繁，特別是明清兩代朝廷主持的大移民和大批北方軍人的滯留四川，便使得北方官話方言的語音和詞彙在蜀方言的發展演變中始終居於主導的地位。這是蜀方言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的根本原因。有學者指出：“四川分佈範圍最廣、使用最為頻繁的四川官話，是明初移民從湖廣、陝西、安徽等地帶入四川的。”^⑤關於這個問題，研究四川人口和四川方言的文章多有論述，故簡略述之。

（二）歷代移民原籍方言的移用

自先秦以來，四川歷代都有移民入川，但對現代四川方言影響巨大的移民活動，還是要數明清兩代的移民活動，尤其是清初的“湖廣填四川”。

研究四川方言内部的各方言點（市縣方言），我們發現：市縣方言之間的差異，主要是由各市縣移民成分的不同和特殊的地理環境（如山河阻隔）形成的。市縣方言之間的差異，不僅表現在語音上，更多地還是表現在詞彙上。至於市縣方言内部的“方言島”現象，也是由於各省籍移民成分的不同或者移民成分的變化造成的。據乾隆十三年編撰的《郫縣鄉土志》記載：“郫自明季遭獻賊革殺之後，土著靡有孑遺……自國初插佔，多廣東、湖廣之民，其他若以山西、陝西、福建、江西入籍者，不過十分之一。”而同治八年重修的《郫縣志·人口》則記載說：“郫之四民，率多秦楚豫粵流寓之人，土著什不得一。”如果兩書所載屬

實，那就意味着在 114 年中，郫縣居民中移民成分由以廣東人為主變化為以陝西人為主了。正是因為這種移民成分的不斷變化，形成了四川方言詞彙的多樣性，或稱“語言雜交”現象。

所謂“語言雜交”現象，是指蜀方言中某些區別於通語的方言詞彙，其實就是各省移民祖籍地方言詞彙的雜湊。筆者曾依據《武漢方言單音詞滙釋》^⑥和《武漢方言詞彙》^⑦兩文所載的武漢方言詞彙，將它們同四川方言詞彙（選點以郫縣方言為主）進行比較。結果如下：

在《滙釋》所收的 491 個單音詞中，與四川方言音義完全相同者 204 個，略有差異者 57 個。在《詞彙》所收的 1606 個複音詞中，與四川方言音義完全相同者 417 個，略有差異者 208 個。

這個比較結果，也反映了“湖廣填四川”的歷史真實。

除“湖廣話”成分之外，蜀方言還雜陳了其他方言區的詞彙。如：事情湊集待辦曰“打門湊”，猪大腿上部曰“髒”，公鷄、母鷄曰“鷄公、鷄婆”，本為吳方言；孵鷄卵曰“菴”，用毒藥使人或動物致死曰“癆”[lau²¹³]，本為東北方言；姊妹之夫互稱曰“挑擔”，妯娌曰“前後”（又曰“先後”），本為秦隴方言；牝猫曰“女猫”，牡猫曰“男猫”，本燕趙一帶方言，等等。有學者指出：“現在的成都話與古人所說的‘蜀方言’已經不是同一個概念了。……今天成都人廣泛使用的一些詞語，如：揹（讀暗上聲，指隱藏）、漚（讀音同惡，指長時間地浸泡），本是楚方言；髒（讀旁上聲，指猪大腿的上部分），本是吳方言；菴（讀音同報，指鷄孵卵）、癆（讀音同鬧，指用毒藥毒死人或其他動物）本來是朝鮮、洌水之間的方言。這些詞語中，尤以楚地方言的數量最大。”^⑧

這部分入蜀移民祖籍方言的詞語，在現代蜀方言詞語中所佔的比例究竟有多大，沒有人作過切實的研究；但是，估計不會少於百分之二十吧。

（三）古漢語“歷史詞彙”的子遺

蜀方言中有一部分詞語，不見於其他方言，却能在古代的字典辭書或其他文化典籍上查到它們的音義。見載於古代文化典籍，說明它們有可能是古代的“雅言”（通語），只是隨着社會的發展和官方語言的整理而被淘汰了。這就是所謂“歷史詞彙”。在許多民族語言的發展過程中，都有過這種“歷史詞彙”。有的歷史詞語，一旦被官方語言淘汰之後便永遠成為了“歷史”；而有的歷史詞語，雖然不再出現在官方語言的詞彙中，却被民間的俗語保存下來，成為了方言詞彙。所謂“禮失而求諸野”，這種方言詞彙是歷史語言的“活化石”，是方言研究工作中最值得注意的材料。

被《蜀方言》收錄的“漏物及地曰𦵏”和“粗略治衣曰敕”，是兩個至今仍活躍在四川人口中而且使用頻率很高的蜀方言詞語。

“𦵏”不僅被《說文》收錄，而且被孔穎達引用來解釋《左傳》文字，足見“𦵏”字曾是通語詞。現代蜀方言讀與“色”同，仍為“漏物及地”的意思。例如：“莫把飯舀那麼滿，謹防到處𦵏的是。”普通話一般說“撒”或“散落”。

“敕”見於《尚書·費誓》：“善敕乃甲冑。”孔穎達《正義》引鄭玄注云：“敕，穿徹之也。謂甲繩有斷絕，當使敕理穿治之。”陸德明《經典釋文》注其讀音曰：“敕，了雕切。”可見“敕”在上古（先秦）是通語詞，但到了唐代就比較生僻了。而“敕”的讀音和意義，都被蜀方言完整地保留了下來。鄭玄所謂

的“穿徹之”，就是現在所說的“用綫（或繩子）把它串起來”，“了雕切”讀 [liau⁵⁵]。今天的四川話，把衣服或口袋被撕裂之後用綫串起來叫做“用綫敕幾針”或者“把它敕倒”，甚至還把人們關係破裂之後重修舊好，也叫做“敕”。

有學者撰文指出，四川方言具有明顯的“存古傾向”^⑨。據筆者考察，類似“漿”和“敕”這樣的古漢語“歷史詞彙”，被四川方言保留下來的不在少數。例如：

見於《廣韻》者：（1）以火乾物曰“焙”（音 [k‘oŋ⁵³]，讀若“孔”。義同通語中的“烘”。蜀方言仍曰“孔”）。（2）小孩好動曰“趲”（音 [tsau²¹³]，讀若“趙”。今通語無與之完全相匹者。蜀方言仍曰“趙”，或言“費”）。（3）嘴饞曰“饞”（音 [soŋ²¹]），讀若“送”的陽平。今有人寫作“𦛲”）。（4）蜚蠊（彩虹）曰 [kaŋ²¹³]（讀若“杠”。今通語曰“虹”，讀若“紅”），等等。

見於《集韻》者：（1）扶持曰“揸”（音 [ts‘ou⁵⁵]，讀若“抽”）。（2）推掀曰“攪”（音 [soŋ²¹³]，讀若“送”）。（3）塵垢曰“坵坵”（音 [tɕiA²¹ tɕiA²¹]，讀若“甲甲”。今通語曰“污垢”），等等。

見於《說文》者：糲穀曰：“糲”（音 [xuaŋ⁵³]，讀若“恍”。今蜀方言曰“糲殼兒”，亦曰“鴨米子”）等等。

應當說，這些古漢語歷史詞不僅是蜀方言詞彙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最能體現蜀方言特色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異讀新詞

所謂“異讀新詞”，是指蜀方言中的有些詞，如果從書面上看，它們跟通語中的詞是沒有區別的，但是聽起來，這些詞的讀

音就跟通語很不相同了。說它們是方言詞，完全是由讀音差異來決定的，爲了稱說方便，姑且謂之“異讀新詞”或“異讀詞”。

根據“異讀”產生的原因，我們把“異讀詞”分爲“古音異讀”、“聲轉異讀”和“合音異讀”三種情況。下面分別加以說明。

1. 古音異讀

“古音異讀”，即由於蜀方言保留古音讀法而跟現代通語形成讀音差異的現象。例如：“摘”讀若“討”，“鑄”讀若“到”，“着”（作助態助詞）和“住”（作動詞的補語）讀若“倒”，“貯”（表示囤積）讀若“堵”，等等。以上幾個詞，單從聲母來看，它們在現代通語中都讀“舌上音”，而在蜀方言中都讀“舌頭音”。根據前人“古無舌上音”的論斷，所以我們認爲是保留古音讀法形成的異讀。

方言中的“古音異讀”，大多是因爲方言語音不與“通語”語音變化同步造成的。比如說，宋元以後的北方官話中，已從見組、精組聲母中分化出了舌面聲母 $[t\epsilon]$ 、 $[t\epsilon']$ 、 $[\epsilon]$ （j、q、x），而蜀方言却不與官話同步或不完全同步，從而形成“異讀”。例如：“街”讀若“該”，“角”讀若“割”，“解”（解結、解洩）讀若“改”，“躬”（躬腰）讀若 $[t\epsilon io\eta^{55}]$ ，“嵌”讀若“刊”，“去”讀若 $[k'\epsilon^{13}]$ （此例僅限個別地區），“鞋”讀若“孩”，“咸”、“閑”讀若“韓”，“下”（一下）讀若 $[xA^{213}]$ ，“陷”讀若“漢”，等等。也有反向不同步的現象，即通語讀分化前的聲母，而蜀方言讀分化後的聲母。例如：“眶”讀若“腔”，“速”、“俗”讀若“學”（音 $[\epsilon io^{33}]$ ），“藏”（躲藏）讀若“牆”。宋元以後，疑母字在北方官話中大多讀影母（零聲母），少數讀泥母

(n)；而疑母字在蜀方言中，除了個別與通語變化同步外，大多數不與通語變化同步。具體情況是：一部分仍讀疑母古音 [ŋ]，如“艾、傲、藕、崖、岩、咬、雁、岸”等；一部分變讀為娘母 [n]，如“疑、倪、孽、凝、牛、彥、唁、硯、業、宜、儀、藝”等。此外，上古語音“娘日二紐歸泥”的現象在蜀方言中表現得比較突出，也造成蜀方言聲母與通語的不同步，具體表現是：通語中很多讀泥母 [n] 的字，在蜀方言中讀作娘母 [n̥]，如“尼泥昵膩溺年念尿聶女”等。

2. 聲轉異讀

“聲轉”包括聲母和韻母兩種情況。聲母轉讀，主要發生在發音部位相同的聲母之間，一般叫做“通轉”。韻母轉讀，情況比較複雜，主要有對轉、旁轉、旁對轉和類隔幾種情況。

(1) 聲母轉讀舉例

拔、跋：二字均為並母入聲，清化後聲母當讀做幫母 ([p])，而蜀方言讀做滂母 ([pʰ])。

鄙：幫母之部上聲，通語讀做 [pi²¹⁴]，蜀方言讀做滂母，音 [pʰi⁵³]。

礦：見母陽部上聲，通語今讀 [kʰuaŋ⁵¹]，聲母轉讀為溪母。蜀方言舊讀 [koŋ⁵³] (音“汞”)，聲母仍讀見母。

佩：並母之部平聲，清化後聲母當讀滂母，今通語讀滂母，蜀方言則讀幫母。

囚：邪母幽部平聲，清化後聲母當讀心母，今通語讀清母 ([tɕʰ])，蜀方言則讀心母 ([ɕ])。

(2) 韻母轉讀舉例

對轉例：蜀方言把開口講話叫做“啞腔”，把張開叫做“啞

開”。其實，這“喳”的讀音是由“張”的韻母發生對轉形成的。蜀方言讀“張”曰 [tsaŋ⁵⁵]，為陽聲韻；其陽聲韻尾 ŋ 脫落，就成了陰聲韻的“喳”（[tsa⁵⁵]）。這在音韻學上叫做“陰陽對轉”。蜀方言把“蓋住”叫“揀倒”。其實，這“揀”（[k‘aŋ⁵³]）是由“蓋”（[kai¹³]）聲轉之後形成的讀音。聲母為“通轉”，韻母則是“陰陽對轉”。發生對轉的條件是：轉讀後的新的音節與原來的音節，韻腹必須相同，發生變化的只是韻尾。

旁轉例：《廣韻》：“虹，古巷切。又音紅。”“古巷切”音“剛去聲”，與音“紅”相比，仿佛差得很遠。其本音為 [kaŋ²¹³]，其又音則為 [xoŋ²¹]。它們的聲母為通轉，韻母即為旁轉變化。讓我們再來看“會”的兩讀音。“會議”的“會”為本音 [xuei¹³]，“會計”的“會”為又音 [k‘uai²¹³]。它們的聲母為通轉，韻母即為旁轉。發生旁轉的條件是：轉讀後新的音節（又音）與本音的音節，韻尾必須相同，韻腹讀音相近。“虹”例中，本音和又音的韻尾都是 ŋ，韻腹 a、o 音近；“會”例中，本音和又音韻尾都是 i，韻腹 e、a 音近。沒有韻尾的音節，其轉讀後的新音節與原音節的韻腹一定相近。例如蜀方言讀“割”曰 [ke²¹³]。“割”的本音為 [kɿ⁵⁵]，其轉讀音節的韻腹 ɛ 和 ɿ 也是兩個相近的音。

旁對轉例：《廣韻》：“蟹，胡買切。”“胡買切”，今音 [xai⁵³]（讀若“海”）；今通語讀作 [ɕe⁵¹]。“蟹”為匣母字，其本音與今通語音，聲母為匣母分化；其韻母的差異，即為“旁對轉”現象。所謂“旁對轉”，即先旁轉再對轉的音變現象。可以理解為：本音的 a 旁轉為 e，再對轉脫落韻尾 i；聲母 ɕ 只能與細音韻母拼切，故在 e 前加上 i。這樣一來，本音的韻母 ai 就轉化